

批判刘國鈞先生的“什么是圖書館学”

北京大学圖書館学系1956年級“什么是圖書館学”批判小組

刘国鈞先生的“什么是圖書館学”一文，自从在“中国科学院圖書館通訊”1957年第1期發表以后，引起我国圖書館学界的注意。北京大学圖書館学系在同年5月25日特地举行了一次科学討論会对此論文进行了討論。这篇文章的全部观点本来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相違背的，但是在那次討論会上仅有人在一些枝节問題上提出过爭論，並沒有涉及到文章的實質，而且大多数人士表示基本同意刘先生的看法，有的人竟要与刘先生求同存異。这說明，刘先生通过大力宣揚资产阶級学术观点，把圖書館学研究拖向資本主义道路的企圖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为了澄清这种影响，在圖書館学的研究上插上紅旗，我們必須对这篇論文加以严肃的批判。

(一)

論文首先提出：圖書館学的对象是“圖書館事业及其各个組成要素”。圖書館学則是“研究圖書館事业的性質和規律及其各个組成要素的性質和規律的科学”。而圖書館事业却是由五項要素組成的：（一）圖書，（二）讀者，（三）領導和干部，（四）建筑与設備，（五）工作方法。圖書館学也就必須对这些“要素”进行深入的研究。文章的头尾也曾提出圖書館学要研究圖書館事业史与圖書館建設原理，但是并沒有作任何具体闡述，避而不談。总之，刘先生認為五“要素”就是圖書館事业，深入地研究这五“要素”即掌握了圖書館学。

这种五“要素”即科学的說法是非常荒謬的。五“要素”决不等于圖書館事业，更不等于圖書館学。

我国的圖書館事业是宣傳党和政府政策的工具，是傳播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澤东思想的陣地，它充分利用書刊資料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向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所以圖書館事业有着高度的政治性和思想內容。孤立的五項“要素”，反映不出我国圖書館事业的根本屬性，相反的只是抹煞了圖書館事业的政治性和思想內容，混淆了資本主义国家圖書館与社会主义国家圖書館的本質区别。錯

誤地把圖書館事业的發展归結为五“要素”的变化，更是割断了圖書館与社会經濟、文化建設的不可分割的关系。

至于圖書館学，則是一門研究圖書館事业的組織、工作內容及如何利用書刊資料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和向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科学。它的对象是圖書館事业及其全部活动。圖書館学的任务是要闡述圖書館学的理論基础和我国圖書館事业的建設原理，总结圖書館工作实际經驗，說明社会主义国家圖書館制度优越于資本主义国家圖書館制度，批判封建的、资产阶級的圖書館学的反动本質，研究圖書館事业史，探討各类型圖書館当前的迫切任务，使圖書館学的研究能推动圖書館的工作不断前进。

这样一門科学，无疑是屬於社会科学范畴的。社会科学是階級斗争的科学，它有着鮮明的階級色彩。而刘先生把这样一門科学的闡述完全抽去其階級內容，我們在五千多字的文章里，根本找不到一个“党性”、“階級”、“階級斗争”、“政治”等字眼。作者把圖書館和蚯蚓、树叶、吃饭、睡觉等自然、生理現象等同起来看待，把圖書館和物理、化学这些自然科学相比，而不和新聞学、法学等階級性很强的社会科学去相比，表现出一付超階級的面孔，把圖書館学与圖書館看成是一种脱离階級斗争、不为政治服务的單純技术性的东西。抹煞了圖書館为統治階級服务的實質。

无产階級是絲毫不掩飾这一点的，我們已在前面明确地把圖書館学的實質清楚地闡述出来了。资产阶級学者那种超階級的濫調，不过是为了麻痹人們的階級意識，维护其反动統治而已。为什么反动派的圖書館中沒有馬列主义著作，进步文学作品也被打入冷宮，而充滿了“中国之命运”、“我的奋斗”之类进行法西斯奴化教育和腐蝕人們意志，荒淫无耻的黃色書刊呢？圖書館的階級性、政治性不是十分明显的嗎？而刘先生却为之打掩护，这分明是自欺欺人。最近，被香港当局无理驅逐出境的杜伯奎先生，就是因为在他所主持的学校的圖書館中藏有十几本

关于新中国的圖書，这不就更生动地說明問題了嗎？

作为圖書館学的研究对象，圖書館是有如此深刻的階級性，那么它本身能够“超階級”，“超政治”嗎？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把这样一門科学的任务仅仅归結为五个孤立的、沒有灵魂的“要素”，而从事“深入研究”，是必定要把它引上“超階級”的死路上去。

馬克思主义者不反对在研究圖書館学时要了解圖書館业务的各个組成部份，而且很重視研究这些具体业务問題，掌握它們之間的內在联系和規律，实现圖書館为政治服务的目的，但决不是局限在这些問題本身的研究上。例如，研究圖書是为了了解圖書、掌握圖書和能够充分利用圖書，而不是去鑽這本書是哪年的版本，那本書是誰家的名刻。列宁同志就曾利用他对馬克思主义書籍的精湛了解，編成“馬克思主义参考書目”，指出了千百万人民学习馬克思主义的途徑。列宁同志这种研究圖書和利用圖書的方法，在苏联和我国圖書館中得到了繼承和發展。但是刘先生却認為“宣傳圖書、指導閱讀”只是一种術語，并且和那种鑽古書堆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等同起来混为一談，这种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做法，只能說明刘先生在現實問題上的无能为力，不能分析不同观点的實質，以致把两个完全对立的观点等量齐觀，視為一事。

圖書、讀者、干部、設備和方法对于圖書館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些东西湊在一起，絕對不等于圖書館学。这正象人口、土地、主权的总和不等于国家一样。国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絕不是这几个因素的总和。何况，圖書館这些“要素”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国家圖書館所独有的，而且資本主义国家圖書館也有，就連封建王朝圖書館也有。把这些东西搬來湊成圖書館学，也就使圖書館学丧失了階級性和科学性内容。

“要素”即科学的說法，本来是資產階級教授、學者們的老門道，他們以表面的“要素”掩盖事物的本質，把人們的思維局限在事物的表面現象上，好象科学的任务就是在于研究这些“要素”，掌握了这些“要素”就成了一个攻不可破的学术权威。但是在这种論調的背后，常常有一个陰險的政治目的，它引誘人們脫離政治、脫離階級斗争，把人們从时代的激流里引向陰暗的書齋，在一些“要素”和皮毛

問題里鑽來鑽去，使人的眼光看不到国家以至天下大事，看不到資本主义制度及其罪恶，更看不到社会主义阳光的燦爛輝煌。脫離党的領導，以超階級的面目來麻醉人的思想意識，削弱人的斗志，漸漸由遠离馬克思主义到反对馬克思主义，当然更談不上去宣傳馬克思主义和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務了。这种以超階級的面目來瓦解革命陣營，反对馬克思主义的手法，毒辣之極。因之，必須对它进行堅決的揭露和无情的斗争。

(二)

离开了圖書館学的階級内容和內在联系，孤立地去研究“要素”的結果，使得刘先生在这些“要素”的解釋和它們之間关系的摆法上非牛非馬，本末倒置。

如前所說，論文在圖書的研究上，不是如何研究利用圖書、宣傳圖書、对讀者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却去鑽那些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圖書生产技术、圖書史等等。

在讀者問題上，沒有分析我国讀者的全民性。不是从党在各个不同时期的方針任务出發，針對讀者閱讀中的傾向，通过圖書宣傳、指導閱讀，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而是沒有階級观点地去研究他們的年齡、职业、文化程度等等的不同，以及他們的“需要”，認為“圖書館就是为了讀者的利益而存在”。这与資產階級圖書館學者对讀者的形式主义研究方法半斤八兩，一模一樣。“需要”、“利益”，是什么人的“需要”，是什么人的“利益”，是无產階級劳动人民的，还是地主、資產階級的？这里刘先生根本否定了圖書館为貫徹党的文化教育政策，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偉大作用。

在領導与干部問題上，不是去研究圖書館如何依靠党的領導，貫徹党的領導意圖，而是去考究空洞、抽象的所謂“領導方式”。領導，是无產階級的領導，还是資產階級的領導？不是去研究如何加强对館員的政治思想教育，使之更快地成为党的宣傳員、社会主义文化戰綫上的尖兵、紅透專深的普通劳动者，不致辜負“人类灵魂工程師”的光荣称号，而是考究“干部应具备的知識”等，把“圖書館事业的灵魂”——圖書館員說得毫無血肉。

在房屋設備上，不是去研究如何因陋就簡，少花錢多办事，認真貫徹“勤儉办館”的方針以加速圖

書館遍地開花，來適應解放了的勞動人民對於文化的迫切要求，而是去追求那些什麼房屋、設備的“規格”、“標準”等等，使這些資產階級的清規戒律再去束縛圖書館事業的發展。甚至还宣揚什麼“房屋建築不當，設備不合標準”，“就會大大妨礙圖書館事業的發展”的資產階級圖書館學的濫調。

在工作方法問題上，不是首先指示工作方法與業務技術只是一種完成圖書館工作任務的手段，而認為“圖書館能否發揮作用主要決定於干部能否掌握正確的工作方法”。現代圖書館之所以成為科學的事業，就因為他具有一套獨特的工作方法。這種早已破產了的方法、技術決定論，劉先生卻又把它拾起來，奉為“至寶”。圖書館是需要一定的工作方法的，但該方法首先應是羣眾路線的方法問題，其次才是業務技術上的方法，而後者畢竟又是次要的、從屬的，一個圖書館能發揮什麼樣的作用，主要取決於館員的政治立場和它為誰服務。問題很清楚，美國反動的圖書館也有一套工作方法。但是卻編出了鼓吹戰爭、喧揚種族歧視的書目，也宣傳了為華爾街大老板們服務的反動圖書。試問，方法技術決定論的胡說與帝國主義者宣揚的武器決定論又有什麼分別呢？

論文不但把圖書館的各有機組成部分割裂成為五個互不相干的“要素”，同時，還認為“五者之中缺少任何一項，就不能夠有圖書館的存在”。表面上看起來是把五者等量齊觀，實際上作者卻提出：“圖書是圖書館事業的基礎”、“房屋和設備是圖書館工作效率的重要的物質基礎”、“方法是做好圖書館工作的主要手段”，方法就構成圖書館管理學，而它与目錄學是“圖書館學兩根重大支柱”。從“基礎”、“物質基礎”、“主要手段”、“重大支柱”這一些詞句中，可見劉先生把圖書、設備、方法三者放在首要地位，而對讀者與領導和干部兩項人的因素的闡述卻是輕描淡寫，興趣不大。這充分反映出封建時代藏書樓觀點在劉先生思想中大大存在。

社會主義圖書館事業中黨的領導是發揮圖書館積極作用的根本保證，而為讀者服務乃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工作成績優劣不在於它買了多少書，工作方法如何，房屋設備怎樣；而在於保證黨對圖書館事業的絕對領導。只有這樣才能夠把圖書、房屋、設備、方法各方面有機地同為讀者服務工作聯繫起來，統一起來，因之才能夠把圖書館組成一個

有機的整體，圖書館才会有生命力。絕對不是互不相干的五“要素”的混合物，或人的因素不起作用的物質因素的無機湊合。這正是社會主義圖書館學在研究這些問題時與資本主義圖書館學的原則分歧點。

由於這種藏書樓思想的長期影響，給圖書館事業帶來了極大的危害。在圖書館實際工作中，不是處處為讀者着想，而是片面地追求藏書數量和設備好壞，不但沒有千方百計吸引廣大勞動人民到圖書館學習，相反的在“保護藏書”名義下，竟閉門辦公，使圖書館脫離羣眾，影響到社會文化教育工作的進行。與此相關的，在工作中認為編目、分類等是所謂高級的、有出息的，對閱覽與羣眾性工作則視為低級的，嚴重地影響了為讀者服務。在圖書館學研究中，也是以過去的老框框來套今天的新問題，死抱著“規格”、“標準”、“藏書數量”等不放，所以對大躍進中圖書館羣眾的大膽革新創造採取藐視、挑剔，甚至是打擊的態度。就連羣眾辦的“小圖書館”他們都不承認是圖書館，當然更談不到叫這些“學者”、“專家”去總結經驗，找出規律，著為理論，以促進圖書館工作的發展，給圖書館學輸送新的血液了。為了使我國圖書館事業不斷發展，跟上全國大躍進的腳步，對一切束縛我們的封建主義、資本主義思想殘余必須進行堅決的鬥爭。

(三)

劉先生對科學的看法是無知的，這不僅表現在對圖書館學的解釋上，就在一般的科學概念的瞭解上也是如此。論文竟提出了：“一門科學之所以能成為科學，首先在於它是具有為自己所特有的研究對象”這種荒謬的論據。

科學，是社會意識形態的一種，它為政治和生產服務。圖書館學之所以成為一門科學，是因為圖書館事業在人類階級鬥爭與生產鬥爭中有着重大的作用。有必要總結圖書館長期的實踐經驗，研究它的發展規律，概括成科學理論，指導圖書館的實踐活動。

可是照劉先生的說法，凡有“特有的研究對象”的全是科學，那麼，研究一個皇帝有多少個妃子，楊貴妃出嫁時是不是處女……等等之流也是科學了？由此可見劉先生在不了解什麼是科學的情況下，也不可能了解什麼是真正的圖書館學，更无从

了解圖書館學為什麼是一門科學了。這就是資產階級學者抽掉階級的內容去闡述社會科學所必然產生的結果，是不能自圓其說的根本原因。

劉先生以維護圖書館學是一門科學的面貌出現，打着反對圖書館學誤解、輕視、否定的旗幟作鬥爭，表面上大大擴張圖書館學範圍，把一些不是圖書館學範圍內的东西也生硬地拉進去，甚至其中還包括有他二十七年前早已肯定不是圖書館學領域內的印刷、裝訂等等（詳見“圖書館學要旨”第12頁）。也許認為這樣圖書館學的範圍就會廣袤無垠，可以打腫臉充胖子，好裝裝門面，別人再也不敢瞧不起了。其實，這不過是個幌子而已。論文之所以用二分之一篇幅大書特書圖書館學是一門科學，是為了利用圖書館工作者對社會上一些片面的輕視的反感，而收買人們的同情心，轉移大家的視線，以便在這種情況下，全面宣揚他的資產階級學術觀點，否定社會主義圖書館學，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用意是非常明顯的。

至於論文前後邏輯混亂，自相矛盾，語句不通，文詞含混朦朧難以理解等等，這裡不打算一一指出了。

(四)

我國的圖書館事業雖說已有一兩千年的悠久歷史，但是，作為圖書館學的研究，卻是在五四運動以後才開始的。當時國內階級鬥爭，無論在政治戰綫上還是在思想戰綫上，都是十分尖銳的。在這種情況下，資產階級學者們卻從日本與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成批地把資產階級圖書館學販賣到中國來，有的是原封不動，有的則是改頭換面稍作修飾掛上中國的招牌。他們披着不問政治的外衣，為資產階級和封建勢力服務，實際上參加了反動勢力對新文化的圍剿。

劉國鈞先生在1934年發表了“圖書館學要旨”，1936年發表了“中國圖書分類法”增訂本，再加上以後各時期的一系列學術活動，建立了一整套資產階級圖書館學理論體系，他也就成了圖書館學領域內的“權威”，並與其他一些資產階級圖書館學者把持圖書館學的研究，使我國圖書館學的發展受到一定影響。

這種情況，直到1949年全國解放後，才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黨在建立人民民主政權的同時，在

全國圖書館中也建立起領導權，這就把資產階級文人學者們御用藏書樓改為廣大勞動人民共同享受文化，接受共產主義教育的基地，也就從根本上攻破了資產階級學者們的基礎，摧毀了資產階級圖書館學，並着手建設自己的圖書館學。這種新的圖書館學，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指導下，在蘇聯先進的圖書館學理論影響下，一天天成長，不斷地壯大。

面對着“皮之不存”的現實，劉先生不得不樹起降旗，承認無產階級領導，口頭上也講起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但是劉先生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並沒有消滅，沒有真正投降繳械，心裡是不服氣的，所以總把自己的錯誤論點當做了不起，並對別人的東西指手劃腳，這不行，那也不行。尤其是对社會主義圖書館學的新成就之一——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分類法，百般地進行挑剔，蓄意貶低其價值。

由於1956年國際修正主義思潮的影響，當時劉先生為了堅持固有的資產階級圖書館學觀點，竟完全丟掉了所有的馬列主義詞句，赤膊上陣，用二十七年前“圖書館學要旨”的翻版“什麼是圖書館學”這篇資產階級圖書館學綱領，來和無產階級爭奪圖書館學陣地（當然此文比“要旨”一書多了一個“要素”——讀者——但貨色未變）。他還說什麼學習蘇聯是百分之百的教條主義，表現了劉先生維護資產階級學術觀點的垂死掙扎面貌。這股邪風在圖書館學界確也曾引起一個時候的混亂。但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戰無不勝的真理，資產階級偽科學無法掩飾它的反動本質，螳臂更不堪反戈一擊，社會主義圖書館學在鬥爭中愈戰愈強，發揮出它強大的威力。資產階級先生們失敗了。現在劉先生已表示要徹底進行自我批判，我們歡迎這種革命的表現，並希望能夠在深刻認識到自己過去資產階級學術觀點反動性的基礎上見諸行動，真正堅決徹底地向無產階級繳械投降。不管任何一個資產階級學者，今天如果再堅持其反動學術觀點不放，那麼，他的命運就會像柯慶施同志說的那樣：“比起辛亥革命後還留着辮子的遺老遺少，只會更加冷冷清清、淒淒慘慘”（“勞動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見“紅旗”1958年第1期31頁）。

(五)

我國的圖書館學，一定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
(下接第10頁)

在圖書館發展史的問题上，杜先生認為各國圖書館界經過許多歷程而能進步到今日的地步，其原因都是由於人類有搜集的本能，如孩子們之搜集玩具。這是完全脫離整個社會文化發展勞動人民是主要動力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而是一種十足的唯心主義的謬論。

杜先生對圖書館學內容的看法完全從形式主義出發，認為“圖書館學的內容只是書、行政、管理三要素”^⑧

大家知道，圖書館學是研究圖書館的收集、整理、保管和利用圖書為政治服務，為生產服務，而不是什麼為“管理”而研究“管理”，不是為了“行政”而研究“行政”，圖書館中的任何工作都是為政治服務的。

杜先生在研究圖書館學的方法上也是形而上學和脫離實踐的，杜先生說：“研究圖書館學的入手方法，就是多讀書，對於普通各門科學，都要涉獵一點，方才可以讀圖書館學。”^⑨杜先生並又具體地羅列了三點：普通的研究；片面的實習和系統的研究。

所謂片面的實習是：“大規模圖書館里面，分部很多，職員數百人，各人都有各人的專門的事。他們對於圖書館一般理論和辦法，是不必過問的。但是對於他們的事，却有研究的價值。……因此一般圖書館的人，實行分工制度，作片面的研究和實習。”^⑩至於系統的研究則是：“把圖書館的某一方面，特別提出，作有系統的研究。”^⑪

杜先生的研究法，就是理論脫離實際，割裂科

（上接第6頁）

指導思想，經典作家們和毛澤東同志關於文化教育的學說，是圖書館學的理論基礎，特別是列寧同志對圖書館事業的指示，更是我們圖書館實際工作和圖書館學研究所應遵循的指南。圖書館學的研究，如果離開了辯證唯物主義和無產階級立場、觀點和方法，那完全是錯誤的。

尤其是隨著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大躍進，我國國民經濟不斷飛躍地發展，人民文化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圖書館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越來越顯得重要。它的全民性正在逐步實現，因而它的任務也就更加艱巨。圖書館事業如何按照經典作家們與毛澤東同志關於文化教育學說中的指示改進圖書館工作，使之適應形勢的發展，怎樣在圖書館中貫徹總路線多快好省地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精神……這一系列的問题，在圖書館學的研究上還都沒有解決。而圖書館實際工作，却已在工農業大躍進形勢

學，作所謂分系統的研究。在杜先生看來，研究圖書館學，就是多看書，而作實際工作的人，不必過問圖書館學的一般理論這種觀點在解放以後，也有反映。資產階級學者總是以理論脫離實踐來反對馬列主義的理論聯繫實踐。

我國圖書館學的“權威”杜定友先生的資產階級貨色正是抄襲了美國圖書館學的一些東西，四十多年來，一方面卑躬屈膝地拜倒於外國尤其是美國的圖書館學之下，另一方面粗暴地否認了我們的民族文化遺產。在他1931年所著的“校讎新義”中竟說“中國無分類法”，“中國無目錄學”來全盘抹煞我國的文化遺產。

今天，我國正在黨的領導下全面大躍進，超英趕美，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我們堅決要拔掉圖書館學界的白旗，樹立起無產階級的紅旗，捍衛馬列主義，與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說作堅決鬥爭，徹底粉碎資產階級的偽科學。

- ① 圖書選擇法 1926年上海商務第三頁
- ② 圖書選擇法
- ③ 新圖書館手冊 1951年中華書局第36—37頁
- ④ 校讎新義 1931年第五頁
- ⑤ 列寧文選兩卷集 莫斯科中文版第一卷第210頁
- ⑥ 圖書館工作 1957年8—9期13—19頁
- ⑦ 圖書館工作 1957年8—9期15—16頁。
- ⑧ 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周刊 1卷1期
- ⑨ 學校圖書館
- ⑩⑪ 學校圖書館 23—24頁

的促進下，有了根本的變化，館員走出辦公室，開門辦館，在車間、田頭、工地、街道遍地是圖書館，到處皆聞讀書聲。白手起家也辦館，沒有設備也借書……圖書館學的研究已遠遠落後於圖書館實際工作。但是資產階級學術思想在圖書館學領域內還有很大影響，不少人還迷信着所謂“權威”，還崇拜着“專家”、“學者”這些不值錢的牌子。因此，徹底清除這一影響，貫徹兩條道路的鬥爭，已成了圖書館學界的迫不及待的任務。批判“什麼是圖書館學”一文，只不過是戰鬥的開始，我們必須深入地研究圖書館學的理論基礎，總結圖書館工作的新經驗，堅決、徹底地揭露資產階級圖書館學的反動本質，更高地舉起馬克思主義的紅旗，把它插遍圖書館學的各個角落，讓我們再接再厲地戰鬥吧！

〔註〕文中引文除已註明出處者外，皆引自“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通訊”1957年第1期“什麼是圖書館學”一文。